

□ 王建柱

陈毅：“粟司令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

1947年，刚满40岁的粟裕，作为华东野战军的副司令员，可谓意气风发。殊不知，此时的粟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45万精锐大军，目的是要把陈毅、粟裕率领的华野赶过黄河，赶出山东。此时粟裕进退两难：撤退，正中蒋介石下怀；硬碰硬去打，没有必胜把握。怎么办？

粟裕天天研究地图，终于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那就是：打打停停，和国民党军在沂蒙山区捉迷藏、兜圈子，在反复的迂回穿插中寻找战机。我华野或东或西，或南或北，与敌人兜了两个多月的圈子，把国民党负责山东“剿共”的顾祝同和汤恩伯转悠得极不耐烦，他们调集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张灵甫的整编第74师对我华野主力发起攻击。

粟裕决心调集全部主力围歼整编第74师。他马不停蹄地向华野各纵队下达战斗命令。6纵队副司令员皮定均曾在淮阴战役中吃过张灵甫的苦头，眼看报仇的机会到了，纵队司令部一片欢腾。不过，粟裕的这个想法即使从今天来看也是很冒险的：就算华野的9个纵队围住了整编第74师，但40万国民党大军在外围虎视眈眈，如果华野不能在最快的时间内结束战斗——全歼整编第74师，那么，外面的40万国民党军队必然会反过来把华野合围住。到时里应外合，华野势必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

陈毅与粟裕俩人在新四军时期就已经开始合作。陈毅身为华野司令兼政委，对这位老部下的能力深信不疑，就把最重要的战役指挥权全盘交给了副司令粟裕，陈毅坚定而充满自

信地说“粟司令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当粟裕把围歼整编第74师的想法告诉陈毅后，陈毅把帽子往桌上一摔说：“我不走了，就打74师吧。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此前，张灵甫曾指挥整编第74师充当先锋，对华野连战连捷，迫使华野退出两淮进入山东。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对粟裕这个对手，张灵甫有些轻敌，他此刻的注意力全在自己人身上。进入沂蒙山区后，整编第74师的优势无法得到发挥——张灵甫是希望把主力控制在平原地区，但上级的命令他必须遵守。为此他曾经发过牢骚：“我是重装备部队，在平原作战，我的炮火能发挥威力，陈毅的二三十万人都来打我，我也能应付。现在让我进入山区作战，等于牵着水牛上石头山，跟我过不去，一定要我死，我就死给他们看看吧！”也许，这只是一句气话，但看得出，张灵甫对我双方态势，心里还是很清楚的。但身为职业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就这样，他一步一步地走进了解放军的包围圈。

抢得先机切断敌军后路

为了吃掉整编第74师，粟裕拿出了华野全部的9个主力纵队。20多万

部队星夜兼程，用最快的速度穿插运动，向整编第74师靠拢。由于情报可靠，各纵队的穿插路线极为精确，不知不觉就把整编第74师从国民党军的大部队里孤立出来，切断了它与友军的联系。但就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一个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突发事件差一点就让这次大规模战役泡了汤。

1947年5月13日晚7点多，华野1纵开始在整编第74师与国民党军整编第25师之间穿插。就在1纵向纵深前进时，整编第74师与他们不期而遇。一个在山岗上，一个在山坡下，两军相向而行。两支敌对的军队在同一座山上行军，居然相安无事、各走各路，成就了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张灵甫以为这支部队是友军，一点儿也没放在心上，他哪能料到这支部队竟然是解放军呢！

5月14日，战斗正式打响。几个小时之后，张灵甫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的整编第74师拉上了孟良崮。沂蒙当地人把又高又平的山头称为“崮”，部队拉上孟良崮，好处是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所有的敌情都能尽收眼底，但坏处是一旦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就只有死路一条。善用奇兵、胆略过人的张灵甫，决心以自己为诱饵吸引华野主力。

粟裕在得到这个消息后，也不禁暗中佩服这个老对手的勇气和决心。但这个方法要取得成功，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整编第74师要能够坚守足够长的时间，并且周围的援军也要能够及时赶来。如果能，就是里应外合，佳谋天成；如果不能，其结果极有可能造成瓮中捉鳖、坐以待毙。面对张灵甫摆出的这步棋，用兵一向谨慎的粟裕此刻已经别无选择，他只能命令部队全力进攻，尽量用最快的时间吃掉整编第74师！

不过，张灵甫也隐隐感到被包围的危险，所以他事先给自己留下了一招摆脱困境的后手，这就是派部队控制住孟良崮旁边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镇——垛庄。这个镇子虽小，但却是整编第74师与后方大部队联系的战略要地。张灵甫派了一个团驻守于此，一旦战局不利，便可以迅速通过这里与大部队会合，做到可进可退，到那时，粟裕纵有三头六臂，也只能徒呼奈何。张灵甫想得不错，却没料到他的对手也想到了这一点，而且行动比他更快。长期以来，每当作战，粟裕最大的爱好就是背地图，战场上的一草一木，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壕沟，都不落下，而且还要实地勘察，把战场附近的地形记得烂熟于心，并要求

部下也要做到。此时面对张灵甫的后手，粟裕早已有了对策，他令旗一挥，命令隐蔽在鲁南待命的华野6纵星夜兼程直扑垛庄。5月15日拂晓，6纵攻占了垛庄，这样，华野对整编第74师的合围全部完成。

“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整编第74师开始拼命了，战斗中，我军的伤亡很大。敌人的意图不仅是要救出张灵甫和整编第74师，同时要乘机全歼华野主力。因此对陈毅、粟裕来说，当务之急是用最快的速度歼灭整编第74师，否则时间一旦拖长，就有可能反遭灭顶之灾。此时一向谦和文雅の粟裕急了，他对各纵队司令们说：“哪怕纵队打光了，只要能把敌人消灭也在所不惜……谁攻上孟良崮，谁就是英雄！现在只有冲锋，后退就是死亡！”

相比之下，张灵甫虽然也是名将，却犯下了一系列致命性的错误。垛庄失守，张灵甫心里一惊，却不以为然，毕竟自己装备精良，友军又近在咫尺，就算自己被合围了，仗着整编第74师超强的装备和战斗力，坚持到援军到来应该不在话下。但他却忘了，

军歌嘹亮：催人奋进的不老经典

□ 叶介甫

军歌与人民军队相伴而生，随着军队的发展壮大一路走来，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感染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革命军人前赴后继、英勇顽强地战斗和生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本文收集整理革命战争时期部分军旅歌曲的诞生和创作过程，重温那段充满激情的战斗岁月。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35年10月，红十五军团在陕西甘泉的榆林桥，接连打了组建以来的两个较大胜仗，歼灭了一部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俘虏了几千名敌军官兵，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当地老百姓热烈拥护红军，许多农民踊跃参加红军，一些俘虏也参加到红军队伍中来。一时间红军部队扩充很快，但部队的成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违犯群众纪律的事件时有发生，对新兵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纪律教育，就成了军团政治部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

恰在此时，周士第、王首道率领的中央红军先遣队也到了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带来了一份《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看到布告后发现，较之红十五军团的前身之一红二十五军唱过的纪律歌，布告内容更加全面和完整，并且通俗易懂。大喜过望之下，于是根据布告内容，参考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苏区时曾经传唱过的红军纪律歌，按照在大别山地区以民间小调填写的一首九字排列的《土地革命成功了》歌的韵律，连夜编写了通俗压韵的歌词，然后和红七十八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华清一起，将歌词填入这支小调中，按照部队行进的

节拍，共同多次修改、反复吟唱，经审阅后刊登在军团政治部的《红旗报》上，当时的歌名叫《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歌词写道：

红色战士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得注意。

第一实行民主的纲领，最后胜利才能有保证；

第二服从上级的指挥，坚决杀敌才能得胜利；

第三说话态度要和好，接近群众言语最重要；

第四买卖价钱要公道，不准强迫群众半分毫；

第五借人家用具用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

第六到处厕所要挖好，不准随便便拉屎尿；

第七优待俘虏要周到，瓦解敌军工作最重要；

第八早起门板要上好，上好门板一律捆稻草；

室内室外脏物要打扫，免得群众心里遭烦恼。

这首歌发表后，由于内容重要，通俗易懂，曲调又是之前的红二十五军战士们熟悉的，好学好记，便于在部队行进中歌唱，因此很快在红十五军团中传唱开来，并唱遍了陕甘宁边区。

1935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举行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会上红十五军团高唱《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立即引起全场注意，毛泽东、彭德怀等听到后都很快站立起来，热烈鼓掌。

“我是一个兵”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这首《我是一个兵》的歌曾响彻祖国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它产生于解放战争后期，创作在抗美援朝初期，词作者是陆原、岳仑，曲作者是岳仑。

1949年，第四野战军第46军转战南下至湖南衡山富塘镇作短暂休整时，传来新中国成立的喜讯。驻地军民一片欢腾。欢乐之余，陆原和岳仑激动地说，军中文艺工作者要为新中国写歌曲。部队继续南下作战，陆原被任命为师文艺工团的文美分队长，岳仑任音乐分队长。依据解放军从松花江打到海南岛的战斗历程，两人共同完成了一首歌《人民战斗员》。但是这首歌拿到部队试唱，战士们反应冷淡，说歌词没有

新意。

此时，师里正在开展“写自己、忆过去”的业余创作活动，快板、顺口溜等如雨后春笋。陆原从中发现一首枪杆诗：“俺是个老百姓，扔下锄头来当兵……”同时有个抗日旧歌：“老百姓，老百姓，扛起枪杆就是兵……”这两首作品的开端，给陆原创作和构思《我是一个兵》以直接启示。

很快，这两者在陆原心头不断磨合，忽然冒出以下四句歌词：“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了万恶的日本鬼子，消灭了反动的蒋匪军！”

陆原笔下的兵，是来自老百姓的人民子弟兵，陆原和岳仑两人经过推敲琢磨，写出了“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两位词作者互相提示，你一句、我一句，取长补短，反复推敲，最后形成了：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嘿！嘿！嘿！枪杆握得紧，眼睛看得清，

谁敢发动战争，坚决打它不留情！”

歌曲创作出来后第一次在师通讯连试唱，效果非常好。战士们说：“这支歌好听、好唱、好记，一会儿就会了。”还有人说：“唱这支歌嘛，真比改善生活，吃饺子还香呢。”

志愿军战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这首在抗美援朝岁月中诞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在那个战火纷飞年代，响彻朝鲜战场和祖国大地。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毛主席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炮兵第一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支预备炮兵部队，奉命第一批入朝参战。10月中旬，连队召开誓师大会前的一个夜晚，麻扶摇辗转反侧，浮想联翩。他想，现在集结在鸭绿江畔的志愿军将士高昂的士气和一往无前的精神，不正是中华民族长期经历内忧外患逐渐培育起来的浩然正气在新中国人民身上的升华和历史延续吗？于是，“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的词句，便跃然纸上。

第二天，麻扶摇把这首诗作为出征誓词的导言写在黑板上，并向全连同志

作了宣讲。团政治处编印的《群力报》和师政治部办的《骨干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首诗。当时，连队一位粗通简谱的文化教员为它谱了曲，并在全连教唱。当1950年10月23日炮一师入朝时，麻扶摇所在的连队就是唱着这首歌过江的。

后来，麻扶摇惊奇地发现，一支支后续入朝的部队都唱着一首曲调乐观、雄壮而坚定有力的歌曲，歌词与他写的这首诗基本相同。当时由于战斗频繁，消息闭塞，麻扶摇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委。直到1953年，麻扶摇才知道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来龙去脉。

原来，志愿军入朝前夕，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到炮一师进行采访时发现了这首诗，就把这首诗放在第一次战役之后他写的一篇战地通讯《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战士的谈话》的开头部分，并作了个别修改，把“横渡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中华的好儿女”改为“中国好儿女”，增强了读音的脆度。当时陈伯坚不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只好说“这是记者在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听到的广为流传的一首诗”。

1950年11月26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篇通讯，并把这首诗排在标题下面，以突出的位置介绍给读者。

一天，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著名音乐家周巍峙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首诗后，他深深感动了，并产生了创作欲望，他仅用半小时就谱出了曲。他还接受了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驥的建议，把“抗美援朝朝鲜”改为“抗美援朝”，署名“志愿军战士词”、周巍峙曲，交给了《人民日报》文艺版主编袁水拍。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和12月初的《时事手册》半月刊，先后发表了这首歌。

歌曲发表后，周巍峙总觉得歌名不够理想。恰在这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旅大市委主办的《民主青年》杂志，以《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战歌》为题，在12月1日出版的第117期上以显著位置刊登了这首诗。周巍峙发现后很高兴，认为“战歌”一词用得好，与词的主题思想和曲的旋律都很贴切，于是就将这首歌曲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治党管党重在基础。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重心下移，不断加强基层、夯实基础。只有党的基层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能有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一，要解决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空心化”的问题。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任务的战斗堡垒。从表面上看，党的基层组织在多数地区和领域都建立起来了，但是，未必党的基层组织建立起来了，其战斗堡垒作用就能发挥出来。实际上，在一些地区，党的基层组织还存在不少问题，一定程度上存在“空心化”现象。比如，有的基层组织“蝇贪蚁害”问题比较突出，有的以个人权威代替组织权威，以个人言论代替法律法规，欺上瞒下，等等。

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对于软弱涣散的基层组织要加强整顿，探索建立一套科学合理、惩处分明的治党管党有效制度。对于农村治理混乱的地区，要选派有能力、有威望、有经验、有魄力的党的干部去担任党支部书记，建立领导能力强、执行效能高的村党支部。城市社区党的基层组织要提高解决基层群众困难和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提高基层群众积极参与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的积极性。只有把目光投向基层，力量沉到基层，指导下到基层，资源倾斜到基层，才能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第二，要加强对党的基层干部的监督和管理。党的基层干部是党联系群众的直接纽带，其素质是党关乎民心所向的重要方面。不可否认，一些党的基层干部确实存在领导能力有限、综合素质较差的问题。加强对党的基层干部的监督和管理，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上级部门、同级党组织和群众监督。首先，上级党组织及纪检监察部门对党的基层干部要加强教育、审计和监督工作。上级组织部门不仅要选好干部、用好干部，还要监督好干部、管理好干部、培养好干部，使基层干部能够健康成长。其次，基层党组织的班子成员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党内民主，并使普通党员能够对领导干部讲真话、讲实话。再次，要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对党党员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基层党组织应确保群众的知情权，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自觉接受

孟良崮是石山，在坚硬的岩石上无法构筑工事，他的部队只能暴露在华野密集的火力之下，一发炮弹打过来，溅起的每一块石头都有致命的危险。

张灵甫还犯下了另外一个最严重的错误：他忘记了离他最近的援军是国民党整编第83师，师长是李天霞。张灵甫和李天霞同为黄埔毕业，又同是第74军（整编第74师前身）军长王耀武的亲信。不过此前，他们俩人为争夺整编第74师师长的位置曾明争暗斗，结果张灵甫把李天霞挤了下去，李天霞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当张灵甫在孟良崮上苦苦鏖战时，李天霞虽然只距离他仅有10公里，但是李天霞只是象征性地派了一个连前进到孟良崮东侧，余部则按兵不动，眼睁睁地看着张灵甫挨打。

尽管李天霞消极以对，但张灵甫的另一支援兵黄百韬的整编第25师却极力援救张灵甫，全速向华野阻援部队发起攻击。华野攻击部队伤亡越来越大，弹药补给也出现了困难。已经有指挥员提出：停止攻击，撤出战斗，以防被敌人包了饺子……粟裕清楚，此刻决定战局走向的只有指挥员的决心。他下令任何人不准撤退，24小时内必须拿下孟良崮。最后的总攻是5月16日凌晨发起的，这场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了16个小时才结束。华野最终攻占孟良崮，张灵甫阵亡，整编第74师宣告覆灭。

整编第74师的覆灭以及张灵甫殒命的消息，像晴天霹雳震撼了国民党统治中心，蒋介石哀叹“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而此战役也成就了粟裕“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壮举。

全面从严治党不可忽视基层基础

群众监督，并做好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工作。

第三，要密切党群关系，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党的基层组织天然地与众​​众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是，有的干部在错误的权力观、地位观的作用下，逐步脱离了群众，并导致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下降。如果党的基层组织在密切联系党群关系中没有发挥好作用，就等于党的组织体系的“神经末梢”功能失灵，党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路程成了“梗阻段”，其结果就会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有效贯彻，党与群众的联系大打折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不出来。党的基层干部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维护群众利益。通过加强思想教育，从根本上牢固树立群众路线；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努力为群众做好服务；完善监督考评制度，以良好的模范榜样带动群众。